

43项重要农牧业科研成果获技术改进奖 其中一等奖26项，二等奖17项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我国又有43项重要农牧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最近获得技术改进奖，其中一等奖为26项，二等奖为17项。

这批科研成果诞生于1980年，是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9月下旬在北京评审出来的。

新涌现的这些成果表明，近几

年我国已注意了品种资源等基础研究、栽培技术和技术推广的研究。同时，对大农业多种项目，特别是油料作物的研究，也加强了。

据称，这次获奖的科研成果，都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先进的技术水平和较高的推广价值。江苏省徐州地区农科所的花生高产品种“徐州68—4”，出仁率和含油率

高，抗涝、抗病病毒性较强，去年推广面积已达230万亩，一般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二至三成。西北农学院的西农莎能奶山羊的纯种选育和推广，使西农莎能奶山羊的产奶性能与体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年，全国各地上报农业部请奖的1980年农牧业重要科技成果共有275项。（得奖项目见明天本报）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列宁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论文①（我们是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②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这位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国家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论文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最早和唯一的前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③会员和1906—1912年前三届杜马的劳动派④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完全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

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們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堕落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百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揭开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俯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

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小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都在这里。

从学理上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数族裔的天真粉刺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说迫使他人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下转第四版）

落实经济政策，改革经营管理制度，走科学养畜道路

内蒙古畜牧业商品率比去年高一倍

今年出售牲畜五百六十一万头，比去年增加二百七十八万头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刘云山报道：我国最大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在认真落实牧区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改革不合理的经营管理体制，走科学养畜的道路，摆脱“头数畜牧业”的束缚，今年畜牧业生产取得了近二十多年来最好的经济效果。

内蒙古自治区虽然牲畜总增率与上年相比只提高2%，但商品率比上年提高一倍多，达到12.7%；出售牲畜561万头，比上年增长278万头；社员自食率达到8.9%，比去年提高2%；皮张、绒毛等畜产品也大幅度增加。今年1到8月，全区细羊毛的收购量就超过去年全年收购量的5.9%。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生产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好的经济效果，主要是由于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对畜牧业经营管理体制作了以下的改革：

——改革以头数为主的畜牧业经济结构，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

——推广羔羊当年育成和肉牛快速育成的科学饲养方法，缩短生产周期，加快周转。

——调整畜群内部结构，扩大繁殖母畜比例。

上海工业生产出现继续上升的好势头

九月份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8%

据新华社上海10月6日电 我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8月份出现工业生产上升的好势头后，9月份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9月份，上海虽然受到强台风和特大潮汛的影响，但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了55.1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8%，比今年8月份增长1.8%。今年9月份的日产值与今年头8个月的日产值相比，增长了3.7%。

上海工业生产近两个月来上升的势头，对全市完成今年工业生产计划有重要意义。

上海工业生产的好趋势，是中

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和讨论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上海所面临的任务，探索上海经济工作的新路子，抓紧工业生产的结果。

9月份，上海工业生产持续地稳步上升，并出现了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振奋精神，实事求是。干部振作精神，群众的气氛鼓起来了，从而进一步挖掘了生产潜力。

二是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和解

决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最近对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作了部署，提出一定要抓紧最后一个季度的生产，一天也不能放松。

中组部发出通知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组织生活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组织生活制度。通知强调，各级党委要通过生活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变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状况。

《通知》指出，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来，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生活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今年上半年，在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过

程中，有25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和94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总局、人民团体的党组召开了生活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抓好常委生活会的同时，还认真抓了地、县、局级党委（党组）生活会。通知认为，各地召

开的生活会，对于提高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增强领导核心的团结，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纠正不正之风，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通知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少数单位还没有按期召开生活会；有的开得一般化，走过场；有的不能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能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把问题摆出来了，但解决得不好的。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改进的。

《通知》根据党的十

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对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县以上党委常委除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党委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常委（党组）生活会，并要按时地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报告生活会情况，开一次报一次。

二、生活会要以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决议和《准则》的规定为主要内容。当前应以六中全会精神为内容，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生产，把精神文明搞上去，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三、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严于律己，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四、各级党委应把健全组织生活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变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状况的一项重要措施，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要一级抓一级，每年至少抓两次，形成制度，持之以恒。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把这项工作抓好。

外贸部长郑拓彬提出四点建议

促进大陆和台湾通商贸易进一步发展

医药管理总局作出决定愿和台湾同行互通有无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外贸部部长郑拓彬就如何促进大陆和台湾通商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问

题，今天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提出4点建议：

一、欢迎台湾工商界同胞来大陆参观考察、洽谈生意、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商品展销会、设立公司代表机构。我各进出口公司愿意派代表前往台湾，同台湾工商界同胞洽谈贸易。

如果台湾工商界同胞愿在海外与我洽谈贸易，我驻外贸易机构、公司代表准备随时接待。

二、本着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的精神进行物资交流，对台湾需要的祖国大陆产品，如：煤炭、石油、中药材等，我们愿以优惠价格安排供应。对台湾能够供应而我又有需要的产品，我将以积极的态度洽商。

三、对直接输入大陆的台湾产品，在办理各种手续上，我将给予方便。

四、我们热烈欢迎台湾经济部官员

同我外贸部有关官员进行会晤，商讨大陆与台湾通商事宜。会晤时间地点可共同商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胡昭衡今天发表谈话，希望台湾医药界的同行、同事、朋友们发扬台湾民主精神，和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胡昭衡说，为贯彻落实叶委员长进一步阐明的对方台方针政策，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作出了4项决定：

一、欢迎台湾医药界同行与祖国大陆积极开展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品等的贸易，互通有无，相互支持。二、欢迎台湾医药界同行与祖国大陆开展医药科学技术交流，特别是中药学术和科研技术的交流，共同努力，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三、欢迎台湾医药界和工商界来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医药生产和科研事业。四、台湾地区如发生灾情、疫情，我医药供应部门可以随时支援。

赵紫阳两国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迪特特里希·根舍时，指出两国间具有长期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的条件和基础。赵紫阳说，我们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点。你们希望中国繁荣富强，我们也希望西欧联合强大。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维护各自的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需要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继续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根舍说，我们两国取长补短，发展经济合作的前景确实是很广阔的。我国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有巨大兴趣。

赵紫阳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他请根舍回国后转达他对施密特总理的问候。根舍转达了施密特对赵紫阳的良好祝愿。

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修德、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瓦尔特·戈伦弗洛格会时在座。

今天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书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根舍一行。

据新华社北京十月六日电 应我国政府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解放武装力量总指挥亚西尔·阿拉法特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将于七日下午专机抵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阿拉法特今日抵京

萨达特总统遇刺逝世

据新华社开罗10月6日电 今天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开罗附近的纳斯尔城陵园为庆祝中东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而举行的阅兵式时，遇刺受伤，经直升飞机送往医院治疗无效逝世。副总统宣布，埃及将继续执行萨达特总统的政策。

上午12时58分，当萨达特总统正在十分高兴地观看喷气式飞机特技表演时，一门受检阅的一三〇毫米的加农炮行进到主席台前突然落下一枚，一名士兵跳下炮车，向主席台投掷了一枚手榴弹，同时用冲锋枪向主席台扫射。然后另外两名士兵也向主席台进行袭击。

今年的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七十年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在我国首次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孙中山先生开创三民主义，表现了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的革命要求。他是伟大的革命家，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奋斗终身，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屈不挠、牺牲奋斗之决心，不断进步、顺应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在少年时代，亲眼目睹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国势危急，发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生”（《有志竟成》）孙中山先生正是在此革命风潮初萌之际，投身革命，他自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后始顿悟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心理建设》）从此致力于中国革命凡四十年，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特别是孙中山先生身患不治之症，犹抱病北上，为谋求祖国统一而奋斗到底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老一辈中国人的心灵深处。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并告诸身边同志说：“我此次北上，为谋和平统一，所谓身边一方计，是开国民会议”，“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犹频频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和平、奋斗、救中国”，乃是孙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宝贵经验。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招待新闻记者时所作

对减少灾害事故、预防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了积极作用

浙江省大力推行安全保卫责任制

本报讯 记者吴克强报道：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全省企事业单位内部，结合贯彻生产责任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大力推行安全保卫责任制，对减少治安灾害事故，预防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起了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浙江省在整顿治安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单位忽视安全保卫工作，有许多可以避免的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没有得到避免，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制度松驰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据对去年全省发生的171起重大的盗窃案件的分析，发生在厂矿企业、商店、机关、学校等单位内部和基层社队企业、仓库、财会室的占93%。这说明，要促进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安全防范工作是一环。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于去年10月初举行第九次常务会议，批准颁发了《关于建立安全保卫责任制的若干规定》，要求全省各企事业单位认真执行。这一规定下达后，各地、市、县委和政府非常重视，层层召开会议，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一年来，省里还总结推广了嘉兴、海盐、嵊泗三个市县和六个单位贯彻安全保卫责任制的经验。

把治安管理制度纳入企业管理之中，或同干部的岗位责任制紧密结合，做到分清责任，奖惩严明，是浙江省在企事业单位内部落实安全保卫责任制的一条重要经验。嘉兴市委和市政府把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关于建立安全保卫责任制的若干规定》作为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规来执行。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或修订了实施细则，把各项安全保卫措施订入企业管理和安全生产、文明生产的各项制度中去，一起订到车间、科室、班组，并将这些规定经常组织群众讨论后，由政府公布实施或作为厂规店规执行。宁波市不少系统把治安管理与职工群众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作为计分评奖的一项内容。如该市区仪表系统的大多数企业，根据省里颁发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发动群众建立和修订了门卫、巡逻值班、要害保卫、金银管理、仓库管理、安全生产等十多个方面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并落实到部门和个人，作为企业管理法规贯彻执行，好的奖、坏的罚。一年来，全系统按安全保卫责任制规定被奖的有117人，内有厂级领导干部4人；同时，对维护制度作出成绩的13名职工给予了表扬和奖励。

经常检查督促，避免有章不循，是浙江各地落实安全保卫责任制的另一条有力措施。一年来，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全省贯彻安全保卫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了两次检查。许多地方进行了系统与系统、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对口检查，查出了不少隐患，进一步落实了安全防范措施。海宁市今年2月通过对工业、商业、公安、保险等有关部门贯彻安全保卫责任制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不安全因素351处，及时采取了防治措施，消除了隐患。

浙江各地通过推行安全保卫责任制，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秩序得到了整顿，安全防范工作普遍得到了加强，特别是一些贯彻执行得好的地区和单位，出现了刑事案件少，治安事故少，职工违法犯罪人员少的新局面，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如嘉兴市131个企事业单位，贯彻安全保卫责任制以来的8个月，只发生刑事案件9起，比前8个月的33起下降72%。嵊泗县全县64个内保单位自去年10月到今年6月，只发生一般盗窃事件3起。火灾、爆炸等治安灾害事故都没有发生。省国防工业系统，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9.4%。

平凡岗位上的辛勤劳动

——记汕头市委热心信访工作的刘淑吟同志

联系，首先解决了大娘一家的燃眉之急，给予定期生活救济。刘淑吟经常找大娘的儿子谈心，鼓励他振作起精神，还送给她一些食品和小孩衣物。经刘淑吟与有关单位多次联系，大娘儿子的工作也得到了妥善安置。

刘淑吟从来信来访中得知：有一家兄妹6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父亲的问题而受到株连，被强行送到博罗县劳教。随后，父母相继死亡，一个弟弟双目失明。1978年，这家兄妹因政策落实而回到汕头市复户，但无房住，长期在街头过夜，生活困难。刘淑吟经过调查，及时将情况向领导汇报，使这家兄妹的就业、住房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979年冬，一位妇女扶着双目紧闭的丈夫上访。这位丈夫因眼病原来在汕头市公园区机械配件厂工作，1970年随厂迁到江西省后，患了精神病，虽经多次治疗，但无好转，提前退休回汕头市。一家5口

学习孙中山为祖国统一奋斗到底的精神

刘 斐

《号召国民会议之演讲》中说：“诸君，兄弟向来主张和平统一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说：“我们国民要想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的方法”。这些有识之见，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孙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永远站在时代潮流前面，与历史发展共同前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他从来不以辛亥革命为终点，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革命事业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总是以革命事业尚未成功来激励革命，所以他能够始终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保皇派及其他反动派进行尖锐斗争，维护民主革命的旗帜。并能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步步深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也不断发展，由旧三民主义发展到了新三民主义。他接受了共产党和国际共产党的帮助，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新时期。

孙中山先生经过无数迂回曲折，终于找到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革命出路。孙中山先生是最了解旧三民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出路，所以他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坚决地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发生了分裂，其统治当局的在左翼要头背叛了革命、反共反人民，抛弃了孙中山先生

革命三民主义的旗帜，终于丧失了中国大陆的立足之地。我从中逐渐领悟孙中山先生为祖国统一奋斗终生的精神，于1949年4月1日，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薰等先生代表国民党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商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由于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致使祖国的统一迄今仍未最后完成。千千万万的亲人隔海相望，有家难归，音讯难通，谁不痛心！当前，台湾当局不顾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意愿，拒绝通邮、通商、通航，拒绝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的统一，并且叫嚷什么“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反共拒和、继续分裂来负隅顽抗，从根本上悖逆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不由我想起，1923年春节，孙中山先生在滇桂军欢迎宴会上演讲中指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督军团造反同割据的联省自治，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华民国便不统一，这个不统一，便是革命没有成功。”孙中山先生的话，迄今仍有现实意义，对于台湾当局不无教益。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把它推向前进，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伟大革命事业。近来，从台湾人

民的利益和台湾当局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关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统一祖国的合理主张。早在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两年多来，在海外侨胞、台湾同胞中越来越引起强烈的反应；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提出九项建议，必将进一步得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所拥护，而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为列祖列宗争气，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这九项建议，顺天应人、宽厚至极，符合国情民意，意义重大，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合情合理，非常得人心的。我看，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台湾当局最好的出路。现在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了，祖国统一的日子不能再延迟了。希望台湾当局能够珍视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的客观现实和所作的种种努力，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早下决心，捐弃前嫌，并权衡利弊，改弦易辙，作出相应的决策，实为至盼。想当年和我一道到达北平的六位国团党和谈代表，现在仅存我一人了。三十二年来，我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共事合作，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我深信在台湾的有识之士，是能够在合作与分裂之间作出正确抉择的，并为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共同奋斗！“和为贵”，同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为什么不能坐下来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呢？

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育青年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是同牡丹江地委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去年以来，地委批转了地委《关于全区共青团的工作经费的农村团组中开展“创家立业”活动的报告》，引起了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主管共青团工作

的地委副书记孙连全同志，每到一处检查工作，都要和县委书记一起听取团县委书记汇报工作，了解“创家立业”活动的开展情况。全地区8个县，绝大多数县委领导同志蹲点的大队的团支部，都建立了青年之家，青年工作比较活跃。

发言。100多名会员选定了婚姻与道德、会员与继承等题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全国妇联副主席、老法学家雷洁琼被选为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康克清、程子华、张友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文摘报》创刊

本报讯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文摘报》编辑部编辑的《文摘报》于本月6日创刊。这是一张摘要选登全国报刊文句的报纸。

《文摘报》创刊号要刊登了《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经济参考》、《学术研究》、《理论与实践》、《人文杂志》、《人民教育》等近40种报刊上的文章，内容广泛，篇幅短小。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半小时就可以浏览全部内容。

《文摘报》编辑部在《致读者》中说：这张小报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求新、求博、求精、求快。求新而不猎奇，求博而不芜杂，求精而不晦涩，求快而不粗糙——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文摘报》创刊之前，出版了6期试刊，受到各地读者的欢迎。

蒙古族优秀共产党员乌力吉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染整车间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乌力吉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业务，团结各族同志，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他以模范带头作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并经常做思想工作，保证了全车间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个车间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仅染料一项就节约2万多元，同时每月增产毛线14—15万公斤。1980年乌力吉同志被评为呼和浩特市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田永有文并摄影

自力更生创办农村青年活动阵地

牡丹江团地委开展“创家立业”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燕报道：去年11月以来，黑龙江省委牡丹江团地委在全区1,610个农村团支部中广泛开展“创家立业”活动，到今年8月止，共建立了1,619个青年之家。青年之家利用业余时间，根据青年特点和爱好，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组织青年学科学、学文化，促进青年健康成长，进一步活跃了农村团的工作，受到了青年的欢迎。

牡丹江团地委创办农村青年活动阵地，目的明确，“创家立业”活动，号召各农村团支部发动青年，自筹资金，自力更生创办青年学习、娱乐和其它有益活动的场所、设施。

现在，这个团支部的青年之家，有活动室、图书室、游艺室。一到晚上，青年们到青年之家看书、看电视、下棋、打乒乓球，活动内容很丰富。穆稷县共和公社，该队青年有“青

郑州市青少年宫积极举办活动

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吸引了大批青少年

本报讯 河南省郑州市青少年宫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努力改进工作，积极为青少年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

今年2月，这所青少年宫建成后，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工作方法不对头，致使许多活动没有开展起来，群众很有意见。面对尖锐的批评，这个宫的领导班子认真检查问题，周密制订措施，决心把青少年宫办成全市青少年的乐园。他们还发动工作人员献计献策，邀请有经验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当顾问，努力改进工作。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兴趣和爱好，他们先后举办了美术、舞蹈、乐器演奏、声乐、创作等不同类型的训练班12个，并成立了一支有130名少年儿童参加的“小红花合唱团”。同时，还举办了“立志成才”报告会、“解放军与青少年联欢会”故事会、夏令营等大型活动；青少年宫的影剧院、旱冰场也经常开放，从而陶冶了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情操。

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400多人次的青少年参加了各类活动，促进了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辛荣昌

仅靠26元的退休金过日子，生活极其困难。因此，他便一直闭着眼睛不说实话，在痛苦中沉默。这位妇女丈夫有病无钱医治，全家生活入不敷出而一度绝望。在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刘淑吟先后帮助解决了她的就业和住房问题，并鼓励她对夫妇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党的阳光温暖着他们的心，她的丈夫睁开双眼，看到了新生活的光明。这位妇女感激地说：“我一家能获得新生，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的。我一定要积极工作，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

为了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刘淑吟同志不仅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对“份外”的事也热心去做。去年，福建长乐县有一人写信给汕头市海东街居委会，要求帮助他寻找亲人。但汕头市没有“海东街”，邮电局将该信送到市委信访科。刘淑吟在公安局的帮助下，详细查阅了户口本，走访了20多户人家，终于为这人找到了失散36年的哥哥。

本报讯通讯员

要求每个青年之家基本做到四有：有活动室、有文体活动用品、有图书报刊杂志、有生动的活动内容。

前不久，牡丹江团地委表彰20个“创家立业”成绩显著的团委，评选了390个优秀“青年之家”，并授予他们镌有“青年之家”的金字牌匾。这些青年之家的特点是，通过开展文体活动，增进青年的知识技能、智慧和健康。目前，全地区的青年之家开办了165个政治理论以及文化补习、农业技术、财会辅导、缝纫技术等学习班，还建立了760个科学实验小组，种子田1,906亩、试验田1,960亩和高产田4,129亩，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已成为育种能手、养猪能手和养鸡能手，更多的人学会了修理钟表、电机、收音机和缝纫机等专门技术。

牡丹江团地委团结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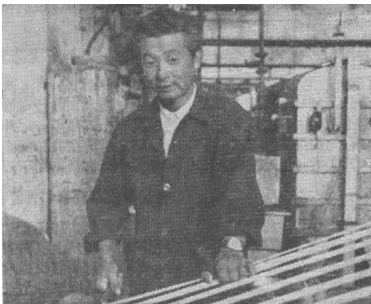
为帮助群众建立幸福的家庭服务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成立

本报建国以来，我国第一个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10月6日在京正式成立。

婚姻家庭问题，关系到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为了适应我国婚姻家庭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成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宣传、活动，为帮助群众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服务。

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妇女、青年、科技、教育、理论、宣传等界的300名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全国妇联宣教部部长陈少敏、北京市



更正 10月5日本报第三版《苗族的史与风俗》一文，“乾隆嘉靖年间”系“乾隆嘉庆年间”之误。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上接第一版)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截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往往停留在这里。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⑤。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初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⑥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

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

在亚洲一个最后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

中国意图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具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农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是极其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一定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

注：

① 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这篇文章的译稿与列宁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涅瓦明星报》上。

台湾回归祖国是人心所向

铁瑛表示坚决落实叶委员长的谈话 加强浙江、台湾两地间的友好交往

新华社杭州10月5日电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铁瑛今天表示，为了落实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加强浙江、台湾两地间的各种友好交往。

铁瑛说，欢迎浙江籍的台湾各界人士回来探亲访友，我们会提供各种方便；欢迎台湾同胞到浙江定居，保证来去自由；热情接待海上遇难的台湾渔民；欢迎台湾的江浙财团和实业界人士到浙江投资，兴办旅游等各种经济事业，切实保障各种合法权益和利润。

铁瑛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省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这一讲话的。

蔡元培之子蔡柏龄博士说 振兴中华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蔡元培先生之子蔡柏龄博士说，叶委员长的谈话，说出了侨居海外同胞的心里话。

这位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法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说，叶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仁至义尽，合情合理，符合民心，真正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照顾到台湾当局的利益，照顾到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迫切希望祖国繁荣富强起来。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没有理由由长期隔绝，在科学技术方面更应当相互交流，共同

研讨。我希望再次回到祖国的时候，能够和同胞们一起，尽量起到桥梁作用。我衷心盼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蔡柏龄为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从法国来到北京的当天，看到了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他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发表了这一谈话。

前孙中山先生的侍卫武官郑卓说 蒋经国应平心静气地同共产党谈判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前孙中山先生的侍卫武官郑卓告诉记者，他看了叶剑英委员长的建议，感到十分高兴。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成功。

郑卓今年已是九十九岁高龄，目前住在澳门。他回忆起共同第一次合作时的情景，兴奋地说，民国十三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我是拱卫军副长官，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听到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心里着实高兴。

郑老先生认为，叶剑英提出的建议合情合理，条件非常优厚。蒋经国应该

从民族大义着想，否则，就对不起祖国。

之灵，对不起整个中华民族。他说，如果郑经国真是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应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同共产党谈判。

郑卓说，现在台湾当局起码要做到，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这是人之常情，我在台湾的一些老朋友，都有这个愿望。我的结拜兄弟马超俊，前些年从台湾来香港探望我，大家见面时，十分感慨。他说，台湾和大陆只是一水之隔，而我三十多年来想回广东台山去探望家乡和亲人的愿望至今还未能实现。我们都认为，这种分裂的局面早就应该结束了。凡是黄帝子孙，都有责任；促成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倪志福会见朝鲜职业总同盟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由金凤柱委员长率领的朝鲜职业总同盟代表团。会见时，双方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倪志福向朝鲜客人介绍了今年中国经济调整的情况和当前的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席子和韩英华，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新华社社评 7月8日所发《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写的四篇新闻稿》（见本报7月9日第一版）中，第三、四两条注释应作如下修正：

1、注释（三），在“宋希濂，1948年8月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官。”之后，增加“同年10月25日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几天后，即被免去新职，恢复原职，未到徐州上任。”

2、注释（四），“杜聿明，当时刚从徐州调到东北，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一句，应改为“杜聿明，1948年10月下旬由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改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热辽边区司令官，11月初，被免去东北任职，恢复徐州原职。”

万里会见苏丹青年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苏丹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阿瓦赫·穆罕默德·拉赫曼为团长的苏丹青年代表团。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万里说，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苏丹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是有帮助的。他希望两国青年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为建设各自的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共青团中央书记刘维明，苏丹驻中国大使马塔尔，参加了会见。

代表团是10月4日到达北京的。

侨办、侨联、致公党中央、政协华侨组举行座谈会

畅谈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希望国民党当局及早回到孙中山先生开创的国共合作的道路上来

参加座谈会的有在京的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以及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代表共150多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林修德、连贵、彭光涵，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晋路，致公党主席黄鼎臣、副主席伍明，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仰理、洪丝丝以及全国工商联、北京市侨联负责人等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怀着

激动的心情畅谈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华侨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他们指出，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从而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广阔的革命道路。他们表示，在新的征途上，要象当年的辛亥革命参加者、当年的华侨一样，发扬爱国精神，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

座谈会上，大家对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谈话感到非常高兴，都说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是归侨、侨眷、国外侨胞梦寐以求的夙愿，要继续努力，发挥桥梁作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纳布利亚托议长率代表团到京

谭震林举行宴会欢迎赞比亚贵宾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由议长鲁宾逊·纳布利亚托率领的赞比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在访问朝鲜以后于今天从平壤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顺道访问。

今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

根舍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答谢宴会

黄华、李强、黄镇、唐克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和夫人今晚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根舍在祝词时表示相信，他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

贡献。

应邀出席宴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祝词时指出，根舍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说，这次访问表明，两国在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务院顾问李强，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冶金部部长唐克等应邀出席了宴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修德和夫人出席宴会作陪。

今晚晚上，修德大使和夫人为根舍副总理兼外长访华还举行了招待会。



赵紫阳同根舍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摄

谷牧会见根舍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和随同来访的经济界人士。

会见时，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会见之后，宾主共进午餐。

今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同根舍继续举行会谈，双方就东亚形势、南北对话和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埃及驻华武官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武装部队日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埃及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塔伊夫准将和夫人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武装部队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等以及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和夫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佛教协会举行招待会欢迎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中国佛教协会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以藤井实应为首、稻冈宽顺为团长的日中友好黑谷本山第二次访华团。

姬鹏飞会见加拿大广播公司总裁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加拿大广播公司总裁埃尔伯特·约翰逊，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和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洛马斯曾参加了会见。

加拿大客人是10月3日抵京的。张香山曾设宴欢迎约翰逊和夫人。他们将于日内离京去西安、上海访问，然后回国。

对外友协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电影晚会，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对外友协副会长楚图南主持了晚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赫穆特·李伯曼和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晚会。

捷驻华使馆武官举行酒会庆祝人民建军37周年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库塔尔上校和夫人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举行酒会，庆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建军三十七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出席了酒会。

方毅会见美国客人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会见美国费森纳实验室所长利夫·莱德曼教授和夫人、美国史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教授伯顿·里克特和夫人，同他们就进一步加强两国交流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等参加了会见。

美国客人是应张文裕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于10月4日抵北京的。

白桦、彭宇同志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剧本的思想错误，是当那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作品的基本情节是：以画家凌晨光的所谓“苦恋”，来表白他如何热爱祖国，但祖国却毫不怜恤他，他遭受百般凌辱，最后含冤死去。作者在描写中，把“四人帮”和祖国相混同，从而把“四人帮”暴政下受难的对象，当成了控诉的对象，使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今年4月，《解放军报》带头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十年动乱的余孽，以及一个时期以来，文艺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因而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一出来，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舆论纷纷；甚至成为国外舆论界的一个议论或猜测的话题，似乎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又要降临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国内外少数不怀好意的人，也乘机造谣挑拨。《文艺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艺评论刊物，没有及时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发表评论，有负于广大读者的期望，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苦恋》表现的是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侧重描写了他在十年内乱中的不幸遭遇。作品从一开始就介绍他是一个“痴恋着祖国和人民的苦苦的恋人”；在情节的进展中，又在多处点出他如何“苦恋”祖国，如何不后悔回到祖国，如何不愿意自己的女儿离开祖国，似乎作者要赞颂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如果是这样，那又有什么可争议的的呢？然而，从整个作品的构思、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以及它实际上给读者造成的强烈印象来看，就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并不是这样的内容，却恰恰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暴露出严重的迷乱和错误。

剧本题名《苦恋》，这爱恋之“苦”，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作品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凌晨光受“四人帮”追捕，亡命齐东，曾与也来避难的史学家冯鸿年交谈。冯在谈到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时，叹息着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单恋，单相思……”凌对此深表同感，答道：“您的比喻太对了！单恋，单相思……”在凌后来的回忆中，自己的这段对话，又作为画外音重复出现。可见，这所谓的“单恋，单相思”之苦，正是作者所赞颂的凌晨光、冯的那种“苦恋”的真正含义，它贯穿于剧本的全部构思中。但是，人们要问：这所谓“单恋，单相思”，果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爱国主义感情吗？

所谓“单恋，单相思”，意思无非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作品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画家凌晨光对祖国始终“苦恋”，而祖国对他却总是无情，因而他陷入了“一辈子都在单恋”的痛苦。作品正是想以此博得读者的同情和赞美。然而，这是无法令人同情的。以凌晨光自己的人生遭遇而论，他在旧社会曾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十年内乱中，又受到“四人帮”的摧残，但是，那些反动势力并不代表祖国，而恰恰是损害祖国的凶恶的敌人；当凌晨光遭罪之时，也正是祖国蒙难之际，怎能说成是祖国对他无情，他只好“一辈子都在单恋”呢？祖国对女儿们的爱，无比深厚，无比博大。儿女对祖国的爱，也应该是肝脑涂地，生死不渝。鲁迅诗曰：“我以我血荐轩辕”；周总理诗曰：“难酬蹈海亦英雄”。多少革命先烈，多少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祖国英勇献身而又无反顾，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许多由于种种原因而受过挫折的同志，他们也始终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忠贞不二，这才是一种可贵的品格。他们绝对不会把个人和祖国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等价交换”，由于个人受到委屈，就埋怨祖国无情，或感叹什么“单恋”、双恋之类。

正是从这个混乱的逻辑出发，整个剧本不是在申辩自白为“苦恋”祖国而没有得到“报偿”的“单恋”之苦，埋怨之说，溢于言表。这种感情，很浅薄或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作者看来，凌晨光、冯鸿年以及诗人谢秋山等人越是不幸，而他们却越是“苦恋”，就越能显出他们那种宗教殉道者式的“高洁”和所谓“九死无悔”的精神，但作者却恰恰忘记了，把“四人帮”的罪恶算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账上，以凌晨光的所谓“苦恋”、“单恋”来衬托和渲染祖国的“无情”，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作者对于事物的颠倒的认识，必然导致作品对社会现象的错误评价：剧本写凌晨光等人是在十年内乱中的悲惨遭遇，正是为了图解作者的这个所谓“单恋”的颠倒认识。剧本写到，凌晨光的女儿星星要随未婚夫出国，凌晨光表示反对，但当星星向他发出这样的质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他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在动乱中思想迷惘的青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凌晨光的无言以对，却是因为女儿的问题正冲击了他们的所谓“单恋”——即深感祖国对他“无情”的痛苦。剧本还写到，谢秋山的妻子云英从海外归国时，身患疾病，她曾在船上欣喜地说：“就会好的，回到祖国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十年内乱中，谢氏夫妇被分别驱赶到两地，当谢秋山从干校回到自己的旧居时，有一只纸妻子的死亡通知书等着他。于是，“秋山的脸抽搐着，似笑似哭，手里的信象秋风中的树叶那样抖起来”，这时，响起了他在船上的那段话的画外音。这强烈的对照，真可谓“震撼人心”，但是，对祖国的谴责，也可谓无以复加了。也许作者会说，这些描写是在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是的，这些悲剧是“四人帮”造成的，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作品没有把控诉的矛头对准“四人帮”，没有把这种描写作为“四人帮”的暴虐和罪行来表现，反而而把它作为知识分子“单恋”祖国的悲剧命运来表现，质问：在这形象的实际感受中，怎么能不给人以祖国无情的强烈印象呢？剧本最后给凌晨光一个悲惨的，在逃亡中冻饿以死的结局，作者特意让他在临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以示他（也是作者）对这种“单恋”命运的巨大疑问和强烈控诉。在剧本的许多

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唐因

唐达成

描写和这个大大小小，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消失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四人帮”的罪行被混同起来；于是剧本本该应该指出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控诉，变成了对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严重怀疑和埋怨。在颇能打动一些人的“苦恋”的面纱掩盖下，竟是这样的是非不辨，黑白混淆，还能说剧本抒发的是—种值得赞美的“爱国之情”么？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种偏见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作品的构思中看到它分明的脉络。作者把凌晨光这样的知识分子与祖国的关系，看成是所谓“单恋”，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是把凌晨光的命运同人民的命运和历史的发 展联系起来观察，却仅仅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样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一叶障目，所看到的就只是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以个人间苦闷，萃于一身，命定是历史的受难者。在《苦恋》中，作者就是用这种偏见来概括、图解凌晨光的命运的。例如作者在剪裁和拼凑他的素材时，把凌晨光在“四人帮”肆虐以前的十年中分明活受到的祖国的温暖和党的雨露春风，统统推到作品的后景上去，而作为陪衬，或作为点缀。凌晨光从海外归来，本是命运的巨大转折，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对他从建国初期到十年内乱以前这一段生活，剧本只以几个一闪即逝的镜头和一段感叹式的旁白一带而过。推到作品前景上来的，则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苦难。似乎这就是他在新中国生活的写照，足以证明他“单恋”之苦，这不仅有害于事实，而且也未免太不公平了罢？这怎能不在一些读者中造成这种混乱的印象：我们整个社会的面貌是黑暗和可怖的呢？

更耐人寻思的是：在凌晨光归国之前，作品还写了一段他在国外的生活。他的出国本来十分偶然，然而一出国就立刻奇迹般地变成大画家，不仅生活十分豪华，而且备受外国公众的崇敬。莫非那个美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艺术家的奥林匹斯山么？在艺术上，这纯属是凭空编造的。然而，编造这种突然发迹的神话，看来是颇有用意的：它一方面是以凌晨光在国外的空前幸运，来对照他归国后遭遇的不幸和公正不正；另 外是要表明，凌晨光在国外如此荣华尊贵，居然能抛弃一切，投奔祖国，可见他是作出了何等巨大的牺牲，何等施惠于祖国。按照作品的思想逻辑，既然他牺牲得重，理应被“报偿”得多，如今祖国给他的却只是苦难，更可见这是多么无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凌晨光对所谓“单恋”的埋怨，与作者所标榜的屈原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屈原挚爱自己的祖国，怨怀亡国之痛，哀民生之不幸，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诗人，他也决非仅仅着眼于己己的荣辱。而人们从《苦恋》中感到的，却分明只是一种用“爱国”的油彩装饰起来的怨恨情绪而已。

人们都明白，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知识分子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不同的命运。今天的爱国主义，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当然，由于环境、教育不同，认识水平不同，觉悟程度高低不同，有的爱国者，对于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能还不完全理解，其中少数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不能接受，但事实表明，如果他真心爱自己的祖国和历史，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最后总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救亡于水火的事业和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许多象凌晨光一样离开祖国多年（多数比他更久）的海外同胞也就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呼：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最近几年他们对于祖国“四化”建设的热情关注，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作者在描写凌晨光这类“苦恋者”命运的时候，如果不但把同人民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考察，反而而于眉毛一把抓，把他们在新中国、新中国和十年浩劫前后的遭遇混为一谈，大肆渲染，那就只能使人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怀疑、失望甚至否定的思想情绪，根本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了。

二

《苦恋》不仅展示了凌晨光的悲剧，并且想揭示这悲剧产生的原因。剧本首次出现的关于佛像的隐喻式的描写，就表现了这种意图。

幼年的凌晨光有一次来到寺庙的佛庵，看见了神龛中的佛像，他问长老：“为什么这个佛庵这么黑呀？”长老“深沉地”答道：“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了。”又说：“奇怪吗？孩子，在世间有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往往相反……”一个虔诚的和尚尚然和善的可爱的小孩作这种凄凄神伤的“哲理”谈话，是很奇怪的，但这自有作者的寓意在。当凌晨光亡命于落第时，这个场面与对话又重演了一次，但这次的再现与第一次有很大不同。这是紧接着关于凌晨光回国后的生活的一些匆匆闪过的镜头之后，身处落魄的凌晨光在幻梦中，“出现了长长的台阶”，他最后总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救亡于水火的事业和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许多象凌晨光一样离开祖国多年（多数比他更久）的海外同胞也就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呼：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最近几年他们对于祖国“四化”建设的热情关注，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作者在描写凌晨光这类“苦恋者”命运的时候，如果不但把同人民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考察，反而而于眉毛一把抓，把他们在新中国、新中国和十年浩劫前后的遭遇混为一谈，大肆渲染，那就只能使人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怀疑、失望甚至否定的思想情绪，根本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了。

作品写凌晨光的“哲理”和凌晨光的幻觉，寓意何在呢？不言而喻，这是在将革命领袖喻为佛像，意在讽喻由于“神”的统治，才发生了十年内乱。当然，林、江反革命集团曾极力推行个人崇拜，在这里他们算乱国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造成的恶果极为深重。文艺作品中触及个人崇拜现象，对此有真实准确的反映和批判，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应该指出：个人崇拜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一定历史

条件下的产物。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的信赖和崇敬，决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崇拜。毛主席的威望是他长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相联系的。当然，由于我国是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人们思想上还存在着封建余毒的影响；同时在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等等，也是出现个人崇拜现象的社会原因。林、江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煽动、制造个人崇拜，使之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因此，一个作者在触及这种曾经泛滥于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时，首先有必要认真地对它的历史、社会根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有可能在作品中作出正确的反映和评价，才能如实地揭露出林、江之流如何极力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实质，也才能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历史的教训。

但是，《苦恋》却并没有这样做。它企图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这比喻本身又是不正确的。它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林彪、“四人帮”是十年内乱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出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神化革命领袖。在我们的作品中，怎么能把革命领袖直接比作“黑色的”神呢？人们可以追问：难道未经香火熏黑，革命领袖就是愚弄群众的金光闪闪的神么？把革命领袖当作佛像，当作封建迷信的象征来比喻，其本身就是至为荒谬的。

其次是，作品通过老和尚的“哲理”，把个人崇拜现象简单地、笼统地归罪于“善男信女”即人民群众的愚昧，似乎群众和群众都不过是浑浑噩噩、盲目迷信的“群氓”，这是典型的唯心唯心论的陈腐观点。作者只看到人民群众中曾经有过个人崇拜的现象，却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正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痛切地感受到了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性，从而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对这种历史的落后现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1976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四五”运动，就是一个伟大的例证。而剧本对所谓“上述描写”，不仅客观上成为对林彪、“四人帮”制造个人迷信的罪责的开脱，而且伤害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正常的信赖和崇敬的感情。诚然，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他的个人专断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曾给林、江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这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但这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由于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党和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伟大的领袖，并对他的历史地位和功过，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怎么能象《苦恋》这样，用荒唐的比喻，来全盘否定党的领袖，嘲弄和贬低人民群众呢？

个人崇拜当然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用虚无主义的态度，用十年浩劫中遗留下来的否定一切的那种盲目性和偏激性，来对待这种现象，那就不但不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必然要导致对于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的全盘否定，导致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的全盘否定，这是十分有害的。众所周知，在十年浩劫中，一切党，否定党的各级组织，否定新中国十七年中的党的建设成就；而当前社会上那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想，正是十年浩劫的后遗症，也是在少数青年群众中泛滥成灾的病态思想的一个严重祸根。作家本来应当运用艺术形象的强大说服力，对这种病态思潮进行正确的疏导。

《苦恋》的作者没能这样做，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这种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令人痛心的。

三

文艺界不少同志谈到，《苦恋》在艺术上也是不真实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导致了对生活的不正确的反映。

作品中虽然用了许多时空跳跃、回忆、幻觉和现实交错，隐喻与旁白相交织等电影手法，似乎意在“创新”，但不能掩盖它在艺术上的致命缺陷：即图解概念。作品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就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艺术的加工，而是从作者预先设定的某些观念出发，主观随意地设计出某些人物和情节，以图解自己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是混乱和错误的。比如，作者作为为表达所谓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单恋”的观念，就不惜把凌晨光归国后得到的温暖，匆匆带过，却一味渲染他的苦难；凌晨光在蚊蚋密集的书斋中藏身，达六月之久（从他的老难友可以随时替他偷到画画材料、各种食品来看，这个书斋是离市镇不远的），以吃生鱼和和藏鼠粮为生，与群众相隔很远，并且居间不同世，甚至对“四人帮”被粉碎也毫无所闻，这种描写已完全不顾及有无生活真实的依据；为了表现“祖国”总是对知识分子“无情”，就把分明是“四人帮”造成的种种罪行，硬与祖国相混同，硬让一个年逾古稀的伟大学家变成一个超级的偷窃能手，让凌晨光临死前也要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问号；而为了形成强烈对比，使祖国“无情”的观念更为突出，就编造出凌晨光顷刻之间在国外发迹的神话，为了表现个人迷信是十年内乱之根源，就生硬地搬出关于佛像和善男信女的比喻，作为注解……总之，一切都围绕于、服务于作者那腐朽的那些错误观念，至于是否合乎生活的真实，是宁可不予顾的。

正是由于在这种完全背离艺术法则的创作方法支配下，整个作品既不尊重生活逻辑，也不尊重创作逻辑，人物活动往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例如凌晨光寄居美洲的家，远在黄浦江上的船家女绿娘和远在欧洲的娟娟，忽也无缘无故地先后到来，并都准确无误地到了展览会上，真是匪夷所思。绿娘本为船娘，在外国奇遇凌晨光之后，立刻摇身一变，谈吐儒雅，也成了知识分子。凌晨光与娟娟相识时，她不过是个幼女，却居然对凌晨大唱爱情之歌，这“爱情”还居然历

久不衰，为了追逐凌晨光，从欧洲赶到美洲，又飞向祖国，满世界寻找。至于剧中场景和细节的失真，就更多了。例如十年内乱中，他正遭批斗，而一家入却能分餐有英文“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娟娟从海外来访，正值“四人帮”肆虐之际，却无人控制监视，竟能叩门直入……。凡此种种，都谈不上有什么时代感或真实性，只能使人觉得，人物如提线木偶，事件如海外奇谈，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完全被地诸脑后了。从这里不难看出：错误的思想和观念，是如何阉割了生活和艺术，而不尊重生活真实的主观图解，又如何加深了思想上的谬误。

据说，有人把这种完全不足为训的手法，称之为“电影诗”手法，或浪漫主义手法，这是很奇怪的。任何富有诗意或浪漫主义感染力的作品，难道能与曲解生活或编造生活相符合么？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家努力开掘生活的真实，是为了深刻地显示真理的力量，而不是模糊或歪曲真理。任意曲解生活，甚至以随意的编造来图解错误的观念，必然窒息了艺术的生命。《苦恋》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四

《苦恋》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错误；而最根本的，是对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从作者之一白桦同志的创作生活以及《苦恋》的教训中，不能不使人感到作者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白桦同志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军队，在党和军队的哺育下成长，对党、对社会主义是怀有感情的。他早年写过《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样受欢迎的小说，粉饰“四人帮”后，在短短的几年内，白桦同志又创作了包括小说《曙光》、诗歌《春潮在望》这些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可以说，这正是他思想上积极健康的因素推动的结果。但是不容否认，当他面临各种复杂的社会的矛盾和社会思潮，同时也面临艰巨的拨乱反正任务的时刻，作者却往往不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观察、判断和评价复杂的社 会现象，并给以艺术的概括。在《苦恋》中，除了一些错误的观点，还流露着一种强烈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思想情绪，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群众意识的反映。凌晨光、冯鸿年、谢秋山的迷惘、怀疑和那种所谓“单恋”的孤愤感，固然和当时社会的状态不可分，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的，但是难道没有他们自身弱点的因素吗？许多知识分子，都曾由于党的政策上“左”倾的失误，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十年内乱时期更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但是，他们难道不正由于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才没有陷入绝境，而终于在困境中顽强不屈地生活下来吗？作者写历史学家冯鸿年遭“四人帮”迫害后，变成了一个疯子，这实在是向持躬正直的知识分子身上泼污水。实际上，我国一切正直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的，凌晨光虽然得到过人民的救助和爱护，却依然陷于迷惘怀疑和孤愤而不能自拔，正是在于在一定条件下，思想感情脱离了人民而形成的，这只有在人民的斗争中，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中，才能得到解决。作者不去揭示这个真理，反而无条件地同情、赞美并装饰这种孤愤与苦闷，以为这才是“遗世而独立”的“高洁”，这不仅没有正确地反映有觉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实际上，这不过是作者世界深处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思想情绪的流露。作者从反对个人崇拜，到自我崇拜或对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的崇拜，陷入虚无主义，这看起来奇奇怪怪的矛盾现象，并非偶然失误，都可以从世界观的矛盾中探寻到它的轨迹。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苦恋》这种政治思想错误，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恰恰是十年内乱中社会上滋生的那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当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创作中的反映。这种错误，不是帮助党和人民在实现四化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对当前尚待克服的错误社会思潮起助长传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有负于文艺家职责的。

十年内乱中，林、江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在人们中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有些青年少，更是深受蒙蔽，使他们黑白俱索，真莫辨真，迷惘和动摇的情绪滋生，旧社会的种种思想余毒就在他们头脑中繁衍起来，再加上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发展到对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的地步。这是党的思想战线、文艺工作在新时期面临到的问题。因此，对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积极主动的、理直气壮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引导，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艺家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在写于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的作品中，对已经分明的重大历史是非，不仅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反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陷于迷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和某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发生共鸣，使自己的作品产生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后果。

邓颖超同志不久前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优秀作品评奖的茶话会上，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文艺家们说：作家、艺术家，应该首先是革命家。革命前辈对我们的教诲，真是善哉益彰，发人深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文艺家应该首先是革命家，是党的思想战线的坚强战士。共产党员的文艺家，更应该坚决地站稳党性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勤奋工作。

当前，我们整个文艺战线的形势是很好的。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应该珍惜、爱护这个新局面。但要使这个新局面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应该开展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前，尤其要着重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我们希望对《苦恋》的批评能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和开展，有助于改变文艺工作者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而对《苦恋》的批评，希望他们能总结教训经验，“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后再写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作品。

（原载《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